

《学术界》(双月刊)

总第94期, 2002. 3

ACADEMICS IN CHINA

No. 3 May, 2002

打假防窃 规范学术

○俞兆平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邵伯周著《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中“闻一多、徐志摩的新唯美主义”一节中的有关闻一多部分,至少有百分之六十来自俞兆平所著《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中闻一多“中期美学思想”一节。这种抄袭是一种“缩写”他文和“袭用”他文观点的手法,很具隐蔽性,因而尤其需要加以揭发。

〔关键词〕《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缩写”;“袭用”

〔中图分类号〕G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1698(2002)03-0137-03

近来,学术上的打假防窃、强化规范,成了中国知识界的热点。我想,我的那笔陈年旧账也该算算了。说是陈年旧账,因为它是近十年前的事了。旧账重提,有此必要吗?有,一则,我的揭发信件当时被压住,状告无门;二则,从这十年的时间维度上,可以看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学界当今愈演愈烈的抄袭、剽窃的现象,正是这十多年来姑息养奸的结果。

事情是这样的:1988年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一书,1993年上海的邵伯周先生在学林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一书。我发现邵著(简称“思潮”)书中“闻一多、徐志摩的新唯美主义”一节(第186—192页)中的有关闻一多部分,至少有百分之六十来自拙著(简称“论稿”)的闻一多“中期美学思想”一节(第27—73页)。虽然,邵著采用了“缩写”这种巧

作者简介:俞兆平(1945—),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编辑部主任。

妙的手法,但仍有多处“硬伤”,露出破绽。于是,我便写了《抄袭之风不可长》一文,托上海某高校一位名人转给了上海某报,而后便无下文了。

我的那封信,现在看来还有点意思,不妨录下一段:“王元化先生早在 1981 年就告诫文学研究界:‘掠人之美据为己有的抄袭之风,似乎至今未引起广泛的注意,很少有人出来加以指摘。我们时或可以看到,有人提出一种新观点或新论据,于是群起袭用,既不注明出自何人何书,以没其首创之功,这种学风必须痛加惩戒,杜绝流传。’”(《文学沉思录》)身处上海,且又是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邵伯周先生应该不至于没读到这段文字的,但遗憾的是,其近著《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中有关‘闻一多’一节,有百分之六十抄袭自拙著《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

说人抄袭,须有证据。现举证若干如下:

(1)邵著《思潮》P191 页:“虽然闻一多也感叹过自身的矛盾性,觉得时时生活在诗境与尘境、肉体与灵魂、感觉与心灵的对立世界里,游移其间;但更重要的还是他对此有自己独到的解释。他认文学为一种‘信仰’,一种‘理想’。在道德上他要以‘基督教的精神’来培养‘有所补益于人类’的‘伟大的同情心’,鼓励自己献身社会,‘自觉地尽点力’。”俞著《论稿》P61—63 页:“闻一多也觉察到自身的这种矛盾性,……肉体与灵魂、感觉与心灵、尘境与诗境、现实与圣地,闻一多在这对峙的矛盾中动摇着、思索着,……闻一多对自身这种美学思想的矛盾性,还从理论的高度上进行了思考与探寻,……诗人应该具有像基督教所倡导的那种拯救世人、献身人类的精神,必须具备‘包罗万有,与宇宙契合’的‘伟大的同情心’,这样,才能获得‘艺术的真源’,才能达到替人类‘自觉地尽点力’的功用目的。”

(2)邵著《思潮》P191—192 页:“当他的思考指向社会、人生、时代精神时,‘伟大的同情心’(在他常表现为强烈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便使他释放出现实主义战斗精神的光芒;而当他的追求注目于诗歌审美艺术时,便又向纯形、超脱的意境去寻求美的奥义,表现出唯美主义的美学倾向。而且,他认为两者是可以互相交融为一体的。”俞著《论稿》P62 页:“因此,在主观上,在抽象的美学理论上,他虽然推崇‘纯形的艺术’,有唯美的倾向;但在客观上,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生活的环境、时代的精神、历史的职责,却驱使他着重于现实,重视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更为接近唯物主义的审美观。闻一多对自身这种美学思想的矛盾性,还从理论的高度上进行了思考与探寻,他认为纯艺术主义与艺术功用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达到统一的。”

(3)邵著《思潮》P192 页:“1931 年,经过长期沉默、思考,闻一多‘一鸣惊人’

写出长诗《奇迹》，在严肃的自我剖析中，响亮地喊出：“我要的是整个的、正面的美”，表示了他反省与清算唯美主义艺术观的决心。”俞著《论稿》P57—60页：“写在1913年，被徐志摩称为‘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奇迹》一诗，……是闻一多对自己多年来所受的唯美主义艺术观影响的总的回顾与清算，是他对新的理想境界的寻觅与探求。……‘我只要一个明白的字，舍利子似的闪着宝光；我要的是整个的、正面的美’，以及联系诗句的前后内容来看，似乎又更应该指艺术上美的理想。”

但这第三点举证的要害，不仅在于文字上的相似而已，关键的是如王元化先生所说的：“提出一种新观点”而被人“袭用”。在国内闻一多研究界的同行们都知道，提出“《奇迹》一诗是闻一多对自己唯美主义艺术观总的回顾与清算”这一新观点的，国内就只笔者一人。1994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闻一多学术研究年会上，武汉大学陆耀东先生在大会发言中就这点对笔者提出质疑：“俞兆平先生第一次提出，闻一多的美学思想，分前期、中期、后期；而中期与后期以1931年为分界线，主要依据之一是1931年发表了新诗《奇迹》，二是1933年发表了《烙印·序》。对《奇迹》这首诗，如何理解，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如将它作为诗人美学思想巨变的标志，则颇牵强。”（见《闻一多研究集刊》总第四辑第5页，1995年2月，闻一多基金会主办）笔者当时即在大会上作了答辩。因为笔者这一新观点是对李广田先生和北京大学季镇淮先生关于《奇迹》一诗的两种论断，提出不同看法，进行商榷的，（详见《论稿》P57—61页）所以才会学术界里引起较大的争议与反响。

行文至此，不能不进行一番对比。同样是上海的学者，复旦大学的吴中杰先生、华东师范大学邓乔彬先生则堪称学界遵守学术规范的楷模。吴中杰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主义寻踪》一书P196页，在征引笔者的观点后，加了页下注：“参见俞兆平《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第28页。”邓乔彬先生所著的《学者闻一多》在“后记”（P454—455）中写到：“当时已读到厦门大学俞兆平先生所著的《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觉得自己难有系统的新见……”，邓先生这里当然是客气话，因为他在该著中多有新见，尤其对闻一多的古典文学研究的研究，有了新的推进。读到这类引文标注、参考文献的文字，笔者往往为他们的学术操守而肃然起敬。

还是以王元化先生的话为结：“我们应该学习马克思写《资本论》那样，对古往今来提出任何一种新见解的理论家，都在正文或脚注中一丝不苟地予以注明。我们必须培养这种学术风尚。”在学术界世风日下的今日，是到了张扬另一种反弹力量的时刻了。

〔责任编辑：徐子〕